红色记忆

# 李汉俊：筹党立纲奔走忙

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眼中，李汉俊是“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董必武回忆李汉俊时也曾说过，“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由生至死，李汉俊37年的人生中，大部分时间扮演着“马克思主义布道者”的角色。

《李汉俊》（版画）

## “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又名李人杰，号汉俊，曾用笔名李漱石、汗等。1890年4月，李汉俊出生在湖北潜江沱埠垸（袁桥村）一个贫寒的耕读之家。李金山共育有3男4女，由于长子书麟早丧，他将希望寄托在次子书城和三子汉俊身上。

1904年，李汉俊与二哥李书城在好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求学，并于1915年7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成为官费（公费）生。在求学期间，李汉俊除学习主课外，还积极学习法语、德语、英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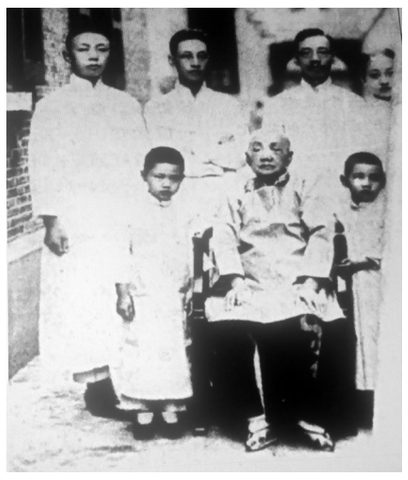
1918年7月，李汉俊归国，寓居上海，带回不少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6月，戴季陶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李汉俊应戴季陶的邀请加盟《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李汉俊的革命热情似火焰，一年间《星期评论》共发表50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有38篇为李汉俊所作。这年10月，英国在华情报机关收到报告称，李人杰（李汉俊的笔名）是2名居住于上海法租界的“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之一。

李汉俊和董必武都是湖北人。董必武曾在《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中提及：“李汉俊新自日本帝国大学土木系毕业回国，住址与上海霞飞路渔阳里湖北善后协会很近，故常与在上海的国民党员詹大悲、查光佛等来协会闲谈。李带有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日本书刊，我借读后，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

李汉俊向来沪寻找救国之路的湖北老乡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久，五四运动武汉地区的学生领袖陈潭秋也来到上海。李汉俊向董必武、陈潭秋等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推荐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2月中旬，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开北京，经天津来到上海，住在渔阳里。他和李汉俊都住在法租界，两家相距不远。陈独秀专门拜访了李汉俊。相同的理想和目标很快使李汉俊和陈独秀走到一起，他们也很快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和亲密战友。



一九一九年，李书城（后排右二）、李汉俊（后排右三）与家人合影。

## 参与筹建党的早期组织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由北京来到上海，找陈独秀商讨建党的问题。在沪期间，维经斯基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等编辑部和一些进步社团负责人，并举行了几次座谈会。李汉俊与陈独秀每次都参加了座谈，认真听取共产国际代表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后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介绍。通过商谈，陈独秀和李汉俊得出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5月，李汉俊与陈独秀一起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前身。

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建立党组织。

7月19日，在上海举行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会议上，李汉俊和陈独秀等坚决赞成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不久，李达从日本回国，在上海首先访问陈独秀，他们谈起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事，陈独秀邀请李达一起成为发起人。

8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马克思主义小组在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陈独秀任书记，主要成员包括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发起组决定由李汉俊负责联络各地的共产主义者。

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一文中，曾称“吾党”为“社会党”，后来才改称为“共产党”。

上海马克思主义小组成立后，李汉俊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并积极与各地的马列主义者或先进分子联系，发展党员，推动成立各地方组织。当时，李汉俊写信给在湖北的董必武，要他在武汉筹备党组织。

董必武接到信后，立即与陈潭秋等谋划。1920年秋，湖北党早期组织在武昌抚院街的董宅成立。年底，李汉俊在回乡途中，还特意在董必武的家中停留，为湖北的党组织深入讲解唯物史观。李汉俊还介绍过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维金斯基的助手马迈耶夫夫妇到武汉协助湖北党组织开展工作，并通过对董必武与湖南的关系支持毛泽东等人组建长沙党组织。山东的王尽美也是通过对李汉俊文章的学习，并在李汉俊的支持下成立了济南的党支部。

## 投身早期工人运动

李汉俊与陈独秀在帮助筹建各地党组织的同时，还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积极支持上海的工人运动。1920年4月，李汉俊与陈独秀一起出席了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陈独秀还在会上作了题为《劳动者底（的）觉悟》的演讲。

1920年5月1日，李汉俊与陈独秀联手在《星期评论》《新青年》同时出版了“劳动纪念号”。李汉俊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强盗阶级底（的）成立》，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发财致富，工人受压迫和剥削的秘密。

1920年8月15日，他们又一起创办了《劳动界》周刊，这是一份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刊物，以简明通俗的语言、形象生动的比喻，向工人阐明了劳动者谋求解放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达到启发工人觉悟、推动工人运动的目的——该刊是我党最早创办的工人刊物，被誉为“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

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成立。李汉俊是发起人之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担任第一任书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向全国各地寄发信件进行联络，在北京、长沙、天津、武昌、广州等地，也先后成立了青年团，成为建党前后十分活跃的革命青年组织，起到了党的助手和后备队的作用。

10月3日，上海第一个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在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开发起会，李汉俊和陈独秀一同莅会，并被聘为名誉会员。

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党》创刊，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这天是十月革命纪念日。

12月16日，陈独秀离开上海赴广东，委托李汉俊代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书记，同时将《新青年》杂志也交给他和陈望道主编。陈望道的《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说：在党组织的筹建过程中，“做工作比较多的是陈独秀、李汉俊”，陈独秀赴粤后，“要紧的事，由李汉俊、杨明斋和我三四人讨论”。包惠僧的《怀念李汉俊先生》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共成立之初，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陈独秀的南下进一步推动了广东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加速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步伐，使1921年间的全国革命形势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新局面。

据李汉俊嫂子薛文淑回忆：为筹措党的活动经费，李汉俊真是煞费苦心，他把教书所得收入和经常写文章所得的稿费大都用于革命之需，有时为了党的活动经费，甚至把当时已故爱妻的金银首饰送入当铺，后由她帮忙赎回。

## 从容应对密探与巡捕

1921年7月30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

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突然从后门闯入，掀开门帘用狡猾的目光扫视着会场的每一个人。这个不速之客的不期而至，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即问他：“你是干什么的？”陌生人吞吞吐吐地含糊其词：“我找各界联合会的王社长，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表示抱歉以后，匆忙转身离去。

代表们感到非常奇怪。马林具有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警惕性很高，他察觉出这个陌生人的危险性，机警地说这个人一定是“包打听”（即密探），并建议会议立即停止。于是，各位代表接受他的意见，开始纷纷撤离会场。

为了掩护同道者，李汉俊留了下来，以屋主亲属的身份与随后而来的法国巡捕周旋。留下的还有陈公博。

果不其然，才一刻钟左右，房外响起了警笛声。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在望志路口停下，车上冲出10多个人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3名法国警官带着4个中国密探进入了室内。他们不由分说，翻箱倒柜地搜查，随后又跟进来几个翻译。他们在李公馆仔细搜查了足足一个小时。

搜查过后，法国总巡傲慢地用法语盘问道：“谁是这屋子的主人？”“我。”李汉俊从容地用法语回答。“你们知不知道开会要事先上报？你们在开什么会！”“我们只是几个北大教授在谈论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并没有开会。”总巡恶狠狠地瞪着眼问：“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还有，刚刚那两个外国人是谁？”李汉俊不慌不忙地回答：“我身兼商务印书馆编辑，也是一名教员，所以，什么书都要多看看，也作为参考、研究用途。至于那两个外国人，他们只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跟随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来上海探讨学术问题的，在这里聊聊天。”

李汉俊用聪明才智和过人胆识与法国人周旋着，总巡也查不出有力证据。之后在盘问陈公博时，也没有问出所以然来。巡捕们在搜查中并未发现政治活动的证据，又得知此处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李书城将军的公馆，加之李汉俊灵敏地把巡捕的盘问应付过去，最后化险为夷。一番折腾后，巡捕一无所获，悻悻离去。

李公馆被法国人安排了密探盯梢，这里再也无法作为中共一大的会场。中共一大的最后一天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李汉俊没有出席。

1927年，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被捕，当晚9时被杀害，时年仅37岁，是中共一大代表中英勇牺牲的第一人。

（据《人民政协报》）

# 抗战时期的高考统招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始于1902年10月14日。当时，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备之后，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招生考试。

在此之后，高等院校逐渐增多，但教育部门始终没有组织统一的招生考试，而是由各高等院校独立命题招生。独立招考，不管是对考生，还是对大学来说都是高成本、低效率的。为了考大学，很多考生要奔波多个城市，参加数场题目不同的考试，需要多次支付报名费、考试费、交通费、食宿费等，花费不菲；而各所大学也要独立完成命题、报名、考试、录取的全部过程，费时费力。直到1938年，为了适应抗战时期的特殊需要，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并组织了首次“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考试”。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全国108所高校中有52所内迁到大后方，其中27所迁到重庆。不过，1938年参加统考招生的院校并没有这么多，当时有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江苏医学院等19所国立大学及独立学院，加上省立广西大学，共20所高校进行了统一考试。考试同时在武昌、长沙、吉安、广州、桂林、贵阳、重庆等12处举行，这些地方都是未被日寇占领的“国统区”。之后，参加统考的高校逐年增加，1939年增加到28所，1940年又增加到41所，覆盖范围大为增加。

按照考试科目的不同，分为文法商教育、理工、医农等三组。考试分四天进行，每年的开考时间不固定，考试分甲卷乙卷，以应付随时出现的空袭。

1938年到1940年，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分别为11119、20006、18151人，录取人数分别为5460、5371、7024人。虽然和现在的高考规模没法比，但组织难度还是很大的。当时日寇飞机经常袭扰后方，招生委员会和考生们要留心的不仅是试卷上的题目，还有空中不知何时会出现的飞机。为了防备空袭，招生委员会特意准备了甲乙两种试卷，首先使用甲种试卷，万一考试过程中敌机来袭，不得不疏散，则在警报解除、考生重进考场后，启用备用的乙种试卷重考。

那时的高考，各科的题目都不多，题型也很简单。比如1938年的国文高考三道题：第一题作文；第二题文言译语体，要求考生将《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段翻译成白话文；第三题语体译文言，将一段白话文改写成文言文。英文考试三道大题：第一题以“四季之美”为题，写一篇不超过300个单词的作文；第二题，将一篇有关中华文明的英语短文翻译为汉语；第三题，将五个中文句子翻译为英语。

哪个年代都有“奇葩”考生，抗战时也不例外。国文、史地等课程，大多数考生或多或少还能够应付，英文就不一样了，部分考生只能空挠头。比如一个男生很豪迈，他觉得自己很可能考不中了，但是抗敌御侮的心一点没减：“我是一个服务两年的师范生，哪里能比得上正经读书人？伤心哉？远摈于大学之门。罢！罢！买舟东下杀敌人！”

还有公然作弊、大闹考场的考生。作家许地山担任过1940年统考的巡视委员，负责昆明区的考场纪律。他记述了这样一件事，7月22日的考试中，一名考生把试卷递给同场的朋友代答，被监考老师发现后，当场没收了试卷。哪知这个考生不服气，在下午的考试开始前，他纠合了一群不参加考试的学生，气势汹汹地闯入考场，握着拳头要打那位监考老师。

由于对报考人员的资格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加上战时投考人数有限，以及组织方有意降低录取标准，统一考试的录取率还是比较可观的。不过，当年女生受教育的机会还是要大大少于男性。1938年，参加考试的女生只占总人数的18%，最终只有809名女生通过统考跨进大学校门，接受高等教育。 （据《北京晚报》）

■ 文人轶事 ■

# 梁实秋“戒烟”记

梁实秋吸烟是有传统的，他曾写过一篇《吸烟》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他家的吸烟史，他的祖父、祖母、父亲都是烟民。梁实秋在留学时染上烟瘾，除了环境影响，可能与他的家族吸烟史不无关系。

1923年赴美留学，梁实秋一人在外，天涯羁旅，有时难耐寂寞，心乱如麻，看到同学中有人在吞云吐雾，好不自在，便试着抽起烟来，且“进步”很快，先是一日一包，继而一日两包，最后发展到一日一听（50支），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瘾君子”。令人惊奇的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已有30多年吸烟史、年近六旬的梁实秋竟悄悄戒除了烟瘾。

有文章专门介绍了他的戒烟过程。梁实秋的戒烟过程很简单，他没有选择什么特别的日子，也没有向戒烟成功的朋友取经，在戒烟的那一天，他自称采用“冷火鸡”似的戒烟法，把尚未吸完的纸烟一股脑儿丢进垃圾堆里，烟嘴、烟斗、烟包、打火机等吸烟用具则在后来分别送给了朋友，只留下烟灰缸没抛弃，可能是为来访的“瘾君子”留个方便。毕竟吸了30多年烟，突然戒烟，起初梁实秋感到很难受，手足无措，六神无主。好在他工作繁忙，埋头著书立说，缓冲了烟瘾发作。实在熬不过时，他就吃一块巧克力，但吃巧克力又感到肚子发腻，于是一盒巧克力尚未吃完，干脆把巧克力也戒掉了。最终他以顽强的毅力戒掉了烟瘾。

梁实秋对晚年成功戒烟很是欣慰，他不无得意地说：“我吸了几十年的烟，最后才改吸不花钱的新鲜空气，如果在公共场所遇到有人口里冒烟，甚至直向我的面前喷射烟雾，我便退避三舍，心里暗自言道‘我过去就是这副讨人嫌恶的样子’。” （据《北京青年报》）

# 高士其与科学小品

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与病毒有着特殊的“缘分”。

1928年，高士其在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实验室做病毒试验时，器皿爆裂，不幸被感染。病毒通过他患炎症的左耳膜侵入小脑，从此给他留下终身不治的残疾。

学成回国后，高士其在刚创刊不久的《太白》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周建人写的《讲狗》一文，让他印象深刻。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确实是一种好形式。受此启发，高士其也拿起笔来，接连写下《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等文章。高士其原名高仕錤，但在发表文章时却署上了“高士其”。有人问他为什么改名，他解释说：“去掉‘人’字不做官，扔掉‘金’字不要钱。”

高士其的科普作品，集科学性、趣味性于一体，生动形象、朗朗上口，深受文化界的重视和读者的欢迎，许多报刊纷纷约稿。从此，高士其开始了他科普创作的丰收年，先后推出《菌儿自传》《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等100多篇科学小品和科学论文。不久，出版社又把这些作品进行分类，结集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

全面抗战爆发后，高士其奔赴延安，成为第一位投奔延安的留美科学家。在延安期间，他用“科学诗”继续普及科学，唤醒民众。他的科学诗，是一种新型的文体，用他自己的话说：“科学中有诗，诗中有科学，科学就是诗，诗就是科学。”

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又创作了70多万字的科学小品，写下了2800多行科学诗，出版科普著作20多部，深受广大群众喜爱。1999年，国际小行星中心把由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3704号小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据《人民政协报》）

# 诗圣的胸怀

“杜从夔府称诗圣”，明朝学者费宏在《题蜀江图》中如此写道。在他看来，杜甫的“诗圣”雅号肇始于夔州的就食生涯，在此之前还未达到“圣”的境界。大历元年（766年），55岁的杜甫离开成都后，辗转来到了夔州（今重庆奉节），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过上了一段较为安稳的生活，写诗交友，关心百姓疾苦，进而思考社会人生。

在夔州，杜甫踏访当地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广泛接触当地农人，深入了解百姓疾苦，写了《夔州歌十绝句》《负薪行》等名篇。他还关心时局，通过在官府的朋友以及朝廷派遣的使者及时了解朝廷动向，写了不少政论诗，如《诸将五首》，内有“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圣朝”等句，讽谏边疆大将要思君报国，不可尸位素餐，实际上也反映出杜甫的忧国情怀。

在夔州落脚的第二年，杜甫的健康状况恶化，先后得过肺病、疟疾、风痹，并且听力减退、视力模糊、牙齿脱落，56岁之人已然这样，相当凄惶，再无当年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灼灼风华。这时的杜甫写出了倾诉长年漂泊、老病孤愁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在夔州期间有个小插曲，杜甫曾将房子借给亲戚吴南卿住，要求他不可干涉贫困孤独的邻居老妇来院中打枣子，特意留诗：“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身在流离中的杜甫更同情他人疾苦，其体贴入微，令人动容。

杜甫在夔州住的时间也不久，因为生计不得不再次举家迁徙。可以说，杜甫人生最后的11年时间，一直漂泊江湖，到处投亲靠友。杜甫后期诗作，有貌似超然之处，但更多的是沉郁悲怆，在政治舞台上，他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但却一直忧国忧民，为了就食谋生，携家带口颠沛流离，59岁逝于避乱的逆旅舟中。

王安石曾高度赞扬杜甫的博大胸怀：“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前圣后贤，惺惺相惜。杜甫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忧国忧民的宽博胸怀，超越了叹穷嗟卑的个人小天地，成为永远的诗界典范，并以其独特的诗风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感人的光。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